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张

磊

自选集

ZHANG LEI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张

磊

自选集

ZHANG LEI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磊自选集/张磊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3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463-6

I. 张… II. 张…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9000 号

责任编辑	杨小虹 张小云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版式设计	虹 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字 数	333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463-6
定 价	61.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陈俊年 黄尚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朱仲南 刘 蔚 李子彪

李夏铭 张小杰 杨以凯 陈海烈

林海华 金炳亮 曾少华 颜泽贤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任：颜泽贤

副主任：梁桂全 蒋述卓 李 萍 王国健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兴 王利文 田 丰 叶汝贤

刘少波 张小杰 李恒瑞 李新家

陈长琦 陈海烈 陈鸿宇 苏立功

肖海明 陆家骝 罗必良 金炳亮

唐钰明 黄尚立 扈中平 蔡 禾

廖小健



张 磊

1933年生于天津。研究员。1950—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修完本科及研究生课程。1958年至今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广东台湾研究会会长等职，并兼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教授。主要著述近三十种，另有论文百余篇。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25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作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类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18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18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写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

一、为什么选择史学研究作为终生事业

我十分赞同和经常援引恩格斯在评论托·卜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所作的申明：“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

这是我从事学习和研究历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以来，逾五十余年岁月而不渝的信念。

这种对专业的抉择和热爱，并非偶然。一方面，显然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姐姐则酷爱文史，涉猎范围广阔。令我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的本质的犀利剖析，使我稚嫩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不仅引发了我

读史的热望，也启示我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对我而言，学习和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与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密切相关的。迄今，我的这种初衷并未改变。另一方面，数理化课程的荒疏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的中学时代正值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少年生活中充满着激情、战斗和憧憬。而在1948年春于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青”后，更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反动统治者进行着垂死的挣扎。白色恐怖使我在进入北京育英中学高一班后不足一月，便被迫暂时避往天津，旋于年底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在河北省泊头镇学习待命。翌年初，我随人民解放军重返津门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稍后，组织在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安排我复学，因为我时年仅16岁，即将大规模开展的祖国建设事业，必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接受了组织的建议，决心重新返校学习。由于对理科课程的搁置，我别无考虑地选取了历史专业——虽然，对未来的经济建设心向往之：梦想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奔波在江河山岭之间。

1950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尽管运动频繁，但在北大的学习终究是极为难得的。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我从史学的学徒起步，逐渐入门，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时光流逝，匆匆已过了四十余年。已逝的翦伯赞、向达、杨人楩、齐思和、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诸师音容宛在，风范长存。健在的张芝联、田余庆等先生依然奋战于史学战线，继续给

我以教诲和激励。特别是导师邵循正教授的严谨学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自己仅从诸师的道德文章中学得十之一二，确是愧对师门。

1958年秋，我毕业即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所长是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杜国庠，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的楷模。我在所内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虽有干扰和冲击，总算不绝如缕，并在前辈学者和同事的指导促进下得以初窥堂奥。在回溯四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历程时，我必须提到中山大学的陈锡祺教授，他对我的长期谆谆教诲，使我作为私淑弟子受益匪浅。

忆昔二十初度，今已年逾古稀，反思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不禁惭疚，虽然这种状况有其客观原因——在十年内乱及此前的年代中，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泰半为各种“运动”所消耗；而社会科学的春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到来后，却又忙于事务。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时至今日，我常常咀嚼着那个讽喻意味深长的譬例：过去牙齿很好，但没有花生米；现在花生米有了，牙齿却差不多掉光了。这不正是我和同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吗？思之令人痛楚！

值得告慰于师友和社会的是：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它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无论历史科学的遭际如何，我始终确认它在社会文明中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我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科学作为终身的事业。

二、读史使人明智

毫无疑问，历史科学承担着重任。

许多哲人曾经就此作过论述。培根的阐释十分中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科学的终极任务，主要在于从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其本质和不同领域、层次的客观规律，使人们得以了然于过去，从而更为自觉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其主观能动性并非随心所欲，只有立足和凭借于客观的条件和因素，人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各式各样的戏剧。因之，历史创造者就必须力求避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以便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效能，并使社会发展较为顺畅和健康。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正是赋予人们活动以理性的主要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愈益深刻全面。历史科学的“通鉴”作用，自是越发增大。

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得史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令其摆脱了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局限，不愧为进步人类认识、变革与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试以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例，它的科研成果所揭示的规律，无可置辩地表明了严峻的真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无论是农民战争，还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抑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不能够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拯救和发展中国，使之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只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

后，中国人民经过反思和比较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才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并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上升到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能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梯。历史证明：唯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和发展中国。

历史科学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它的主要载体。显而易见，历史科学的这个职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健康发育的民族，都不可能抛却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是有害的偏见，“全盘西化”的侈谈则无异于痴人说梦，以致曾是主要倡导者的胡适后来也不得不加以修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观念取代。当然，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有赖于对它进行科学的理解、辨识和取舍，使之具有时代精神和新的内涵。在这种意义上，全盘肯定同样是有害的偏见。历史科学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它的认识功能是广泛的：既综观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又横览了社会生活的断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阐明了事物的本质，确认了它们存在的依据和作用，从而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辨识和取舍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此外，历史科学还是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主要手段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能容忍外来的侵袭和内在的压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绵延不绝。这个伟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不仅善于悲叹自己的命运，并且决心改变屈辱惨淡的处境。长

期以来，积淀深厚的崇高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附丽于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为杰出人物的思想与实践。经由史学（它的各种形式的著述）的传播，后人得以认识、继承与发扬光辉的传统，不仅在思想上予以认同，并在情感上蒙受感化。不言而喻，熟知此伏彼起的、波澜壮阔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史迹，读过《正气歌》、林觉民等烈士的遗书、孙中山的演说、鲁迅的杂文……必然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提高了民族的综合素质。至于当代众多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对人们更为切近，发人深省，令人奋起。

以上所陈，只是荦荦大端。历史科学的作用和意义，当然远不止此。随着史学研究的改革，它的多元的社会功能必将强化和发展。

三、史学改革如是观

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必须在自我完善中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研究也要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潮流，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历史教育”被人们所重视，即是从一个方面充分表明历史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中的不可代替的地位。

史学研究的改革，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史学理论、方法论到具体形式，无不涵盖。但是，中心课题还是理论、方法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学风与文风，因为这个课题关乎历史科学的存废兴衰。其余问题当然也很重要，却不具有根本的意义。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堪称历史科学的灵魂。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审查，史实的辨识、考订和确认，自然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依据，因为论断只能产生于研究过程的终端。把握了准确的、典型的充分史实，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但是，历史科学决非局限于史料的排比和史实的判明，它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这就要求揭示现象的本质及其必然联系。因之，理论、方法论不可低估。当研究过程进入分析论述阶段，既有赖于世界观的理论指导，又离不开方法论的实际运用，简单的初级逻辑思维在这里往往显得无济于事。标榜摒弃任何理论指导和崇奉“历史客观主义”的史学家，难免沦为并不高明的哲学的俘虏。对于历史科学说来，理性是绝对必需和不可须臾背离的。

在史学研究的改革中，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原则。史学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在于它拥有科学的理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迄今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指南和科学手段。它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指出了群众、阶级、政党与个人的相互作用，判明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因而，对历史研究具有根本性、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方法论，正是我们的历史科学的优势所在。当然，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摒弃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戕害了历史

科学。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它科学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必须充分吸取先前的和当代的一切科学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和丰富，永葆其生命力和活力。至于它的某些具体论断，或是已经不适合新的实际，或是在当时已不尽然，则应加以补充和更替。坚持和发展，乃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

信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拒斥古今中外其他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这里，主要侧重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而言。对西方的历史哲学一味膜拜是盲目性的表现，因为引进过程中缺少分辨。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同样是缺乏分析的非科学态度。高墙深壑，拒斥一切，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准则，只会使自己的思想封闭和僵化。事实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值得吸收和借鉴，尽管其中包含着杂质和水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当是有所分析和选择的“拿来主义”，只要这种理论、方法论裨益于历史研究。况且，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理论、方法论的更新和多元化，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有助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和反映历史，必须不拘一格，吸取具有科学因素的理论、方法论的优长，为我所用。史学从封闭僵化走向改革开放，着重体现在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近年来的一些史学著作就是实例，它们由于采取了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诸多视

角和比较、计量等各种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得丰富而新颖，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使过去一度盛行的某些干瘪枯燥的论著，大为减色。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史学家们应用理论、方法论的灵活态度堪资借鉴。他们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理论、方法论。甚至同一研究对象，也不排斥采用相异的理论、方法论。研究历史进程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较为侧重社会经济状况。探索个人的思想与实践时，则更多地求助于心理分析。事实上，西方的哲学不断分化、翻新和变易，一种理论、方法论的流行时间往往很短，就为另一种“新思潮”所取代。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曾与许多外国史学家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其时，“新三论”已经更替了“老三论”，结构主义不再时髦，有不少学者服膺于新结构主义。他们对于一些概念的涵义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有关“异化”——一度在我国理论界成为热点——的诠释就有二百余种。这种状况不足为训，但在丰富史学著作的内涵和形式方面有着积极意义。我们对于理论、方法论的认同应当更为广阔，允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一元为主，辅以多元因素，只会使史学理论、方法论有所发展，从而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对于史学工作者说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改革的进程不能中止。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必须彻底清除，沿袭已久的陈腐观念应当继续打破。但是，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不可背反，更不能有悖于科学，挣脱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桎梏，才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此而已，别无其他。不加分析地标榜“反迷信”，笼统地要